



1954年12月12日至18日，中共太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市海子边人民礼堂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原市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全省地市级最早召开的一次党代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太原党员人数少，分布不均衡，党的组织机构处于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市委根据党章和中共中央、山西省委的指示，从1950年到1953年先后召开三次中共太原市代表会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行使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全市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党的各级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由1949年的117个发展到810个，党员总数由1913名发展到20851名，具备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为贯彻执行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的制度，依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1953年8月华北局“关于加强领导工作的几项规定”，市委决定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7月26日，市委第229次常委会就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若干准备工作作出部署。11月19日，市委向省委发出《关于太原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拟定12月13日召开大会，预期会期6天。经省委批准，会议提前至12月12日开幕，18日闭幕，实际会期7天。

此次大会的正式代表318人。大会的任务是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动员全党，迎接新的工业和基本建设任务，为把太原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而奋斗。

王大任代表市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麻贵书作总结发言。会议检查和总结市委过去五年来的工作，肯定了恢复时期和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作出基本的部署。会议认为，太原是一个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城市，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之一，应把工业基本建设任务作为全市今后的首要工作。为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市委参照武汉、天津两市的经验，决定吸收各主要厂矿和新建扩建单位的负责同志作为市委领导成员，适当扩大市委委员名额。将最初确定的市委委员由原来的19名扩大到29名。太原钢铁厂、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矿山机器厂、山西机器厂、二四七厂、二四五厂等厂矿主要领导均当选市委委员。

从党的代表会议到党的代表大会，是名称上的变化，更是党执政规范化的标志。太原市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关于在今后三年内发展巩固党和训练基层干部的决议》，明确了“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为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保障、指明了方向。会议结束一周后，《山西日报》刊发太原市第一次党代会的新闻，并专门配发《吸取太原市党代表大会的经验》的社论，供还未召开党代会的市、县参考。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太原市的第一次党代会

见证历史进程的蒙山大佛

孙 珉



【蒙山开化寺遗址】

蒙山开化寺遗址名列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晋源区蒙山北峰，古称“并州大寺”。遗址包括开化寺大佛阁遗址、蒙山大佛遗址与连理塔。北齐时于蒙山北峰凿开岩为大佛，坐北朝南，面宽29.6米，进深17米，通高46米。蒙山大佛及大佛阁遗址是现存中国北朝时期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遗址，为研究大佛的雕造技术和早期佛阁形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太原蒙山大佛建于北齐时期。史志记载，北齐天保二年(551)，北齐文宣帝高洋赐开化寺，在寺后凿石修路，依山凿刻大佛。据唐代记载，大佛“高二百尺”，按唐普通尺计算约合今63米。蒙山大佛历经北齐五个皇帝，历时20余年，至后主高纬时建成。据此记载，蒙山大佛比凿于公元713年的乐山大佛早了162年，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早了一个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石刻佛像。

北魏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鲜卑人建立政权后，热衷学习汉族文化，随着北魏文成帝迁都，汉化达到了高潮。太原作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城市，佛教也随着民族融合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人们生活之中。是时，山西境内出现了诸多高僧，如西方求法第一人——法显，净土宗前几位创始人慧远、昙鸾，西域高僧佛图澄也曾在山西活动传法。

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期，晋阳作为高氏政权的大本营，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氏父子几代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晋阳城周边依山凿石，大建寺庙。规模宏大的天龙山石窟、童子寺大佛、蒙山大佛等都出自这一时期。《北齐书·幼主高恒》中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燃)油万盆，光照宫

内。”“宫”指晋阳宫，即现在晋源古城营村一带。一晚火烧掉一万盆油，光亮能照到十几里之外的地方，其工程耗费之巨可见一斑。

蒙山大佛在开化寺后而建。开化寺是北齐皇家寺庙之一，隋朝时改名为净明寺，兴建佛阁以保护大佛。李渊任太原留守时，曾多次来此礼拜。

隋末大乱时，李渊之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筹划起兵，李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唐固我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及矣。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济那时也”。李渊认识到，历山这支横行山西的反抗军队和实力强劲的突厥是起兵反隋的腹心大患。何时起兵？李渊举棋不定。

《乾隆太原府志》卷四十八记载：“法华寺，在县西十五里蒙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建，赐额‘开化’。后凿石通蹊，依山刻佛像，高二百尺，后主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隋仁寿三年建佛阁，改净明。时唐高祖在藩邸，至寺瞻礼，夜梦满空毫光万丈。及即位，复改开元。”

李渊在起兵前参拜蒙山大佛，当晚就梦见佛光照耀，以为祥瑞，从而坚定了起兵的决心。这才有了晋祠祈雨，借口私通突厥，将隋帝派来监视李渊的太原副



蒙山大佛(AI生成)

留守王维和高君当当场拿下处决；太原起兵，开始向长安进军。建立唐朝，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就此揭开了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瞻礼蒙山大佛后夜梦佛光、因而坚定起兵的说法，虽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却在地方志与民间传说中流传甚广。这类带有神异色彩的叙事，在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并不鲜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类记载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与社会心理，而非事件本身的神秘色彩。在古代社会，帝王或起义领袖常借助祥瑞、异梦等超自然叙事，来彰显自身天命所归，强化起兵或继位的合法性。李渊起兵前夕，面临内部整合与民心凝聚的关键时刻，此类“佛光兆瑞”的传说，无论是事后附会还是当时有意传播，均有助于塑造其“受命于天”的形象，以赢得民众及士人的心理认同。



“国保”背后的故事

(21)

鱼沼为什么是方形

武会杰



左图：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右图：广东阳江学宫的泮池。(资料图片)

鱼沼飞梁位于圣母殿前，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十字形桥梁。北宋天圣年间，晋祠圣母殿重建竣工，“圣母池”也就是鱼沼同时筑成，它利用古晋水南河河道，堵塞南北两头修砌池壁而成，其池底是古晋水南河河道。

古人以圆形为池，方形为沼。那么，鱼沼为什么修建成方形？

晋祠圣母殿是为北宋章献明肃皇后刘娥营建的祭祀建筑。在祠堂前建池塘，是自周代而下传承的祭祀规制。因此，研究鱼沼的形制，需要和帝王的祭祀建筑相比较。

在周代，除了太庙这种正统的祭祀建筑，还有一种祭祀先王的建筑，即明堂+辟雍。《礼记·考工记》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都是类似太庙的祭祀建筑。周代明堂周围有圆形池塘，即辟雍。辟者，壘(圆形玉)也，雍者，蓄水池也。

典籍虽然没有专门记载祭祀已故皇后的建筑前配什么样的池塘，但按周礼，祭帝一乾一天一圆，祭后一坤一地一方。祭祀女性先人，池塘理所应当是方池。晋祠圣母殿，正是周礼的传承实例。

还有一个可比较的例子是孔庙和官学前的泮池。泮池是古代官学的标志，依古礼，天子太学中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又称泮池。这是因为孔子自唐代受封文宣王，位同诸侯，所以建半圆的泮池为其规制。《诗经·泮水》篇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等句，意指古时士子在太学，可摘采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文才。有的孔庙在泮池畔壁中央嵌着“思乐泮水”的石刻，便是出自这个典故。

所以，在晋祠圣母殿前建方形水池，是传承周礼规制、体现周礼祭祀女性先人的皇家建筑格局。

此成为北魏军马输送的重要枢纽。

东魏北齐时代，太原作为“霸府别都”驻扎重兵，高欢在晋阳大兴生产，专辟田地种粟，并饲马数千匹(《北齐书·斛律金传附子光传》)以备用。许多追随高欢家族开国的北镇勋贵也在太原生活，留下了众多与马相关的史迹。

李零先生指出，中国的马有汉马(蒙古马)和胡马(中亚与波斯马)之分，汉马腿短肥臀，胡马则相对瘦高。东魏北齐高官徐显秀墓壁画中的马形象属于典型的“汉马”，但“胡马”亦有在其同时期的其他墓葬中出现，可见南北朝时期不仅民族在融合，马也在经历一个融合的过程。北朝人爱马，北齐皇室的御用画师杨子华便以擅长画马闻名，有“画圣”之称，而太原娄叟墓壁画里的马，据说就体现了杨子华的绘画风格。

唐朝，太原作为北都，驻扎重兵。武则天称帝后，任命崔神庆为并州长史，为鼓励其尽心任职，武则天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军马”，并且“前后(并州)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旧唐书·崔神庆传》)。从武则天的话中能看出，太原的战略地位与马关系紧密。安禄山密谋反唐前夜，也曾觐见太原的军马。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原作为抗敌前沿，承受了巨大压力，唐廷专门派郑景山前往太原安抚人心。然而郑景山却想杀神将立威，有人求情，提出“入一马以赎死”。马在太原能够被唐朝将士当作抵罪的工具，证明其在当时的价值并不低。

北宋初期，赵匡胤征伐割据太原地区的北汉政权，在晋祠的古泉饮马，为饮马泉的得名增添了新的注脚。元亡明兴后，明朝为了防范遁入大漠的北元残余势力卷土重来，除设立九边军镇外，还在内地广泛推行马政，积蓄军马。据《山西通志》记载，“山西设行太仆寺，以督备边马政”。太原因靠近大同军镇和明朝的京畿，责任重大，也设置有管理军马的专职机构。今天太原市内许多和马相关的地名，都是在明代出现的。

明末清初，晋商兴起，马成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运输工具之一，来自各地的商帮频繁穿梭于太原与其他城镇之间。例如，位于今天太原市晋源区的店头古村落，就曾是马帮歇脚的中转场所。近代以降，随着工业文明兴起，作为交通工具的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太原马事

逆北

马是一种很挑生活环境的动物，过于炎热潮湿容易染上病菌，丘陵沟壑多的地方则不利于其展现天性，因此，中国历史上的高头大马多来自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太原虽然是一个盆地，但地处农牧交界线，紧邻太原的雁北地区海拔相对高，气候寒冷，较为适宜马生存，于是，太原历史上，频繁出现马的身影。

晋源区的考古发现显示，春秋晚期的晋国大贵族赵鞅墓地及其车马坑出土了古战车16辆，战马遗骸46具，不但为太原2500多年的建城史提供重要佐证，也反映出马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地位的象征。



太原娄叟墓壁画上的马(资料图片)

战国初期，北方少数民族策马南下，给赵国带来不少烦恼，太原作为赵国的发家地，也受到威胁。于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以轻骑兵取代车兵，迅速提升战斗力。但他的想法遭到了以叔父赵成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赵武灵王反驳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史记·赵世家》)。”意指如果依照书本来驾车，无法让马的体能发挥到极致。太原原为地区地势较高，水草丰美，适宜养马，这为赵武灵王组建骑兵部队提供了现实基础。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赵武灵王的远见卓识，太原周边的胡族兵力不仅受到遏制，赵国还乘势灭中山国，西扩版图至榆中地区，形成了与秦人争锋的格局。

汉初，匈奴势力强盛，太原处在草原骑兵的直接威胁下，加之镇守太原的韩王信投降了匈奴，更加剧了汉朝国防的压力。汉廷明面上以和亲维系与匈奴的关系，暗地里扩建骑兵力量，娄烦马场得到汉廷的格外重视，并成为支撑汉武帝霸业的物质力量。

汉廷扫除匈奴的威胁后，边疆暂时归于安定，游牧民族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将马作为商品与中原王朝交换，太原的马逐渐多了起来。据《晋书》记载，西晋时太原地区名士王湛不仅能自如驾驭烈马，“姿容既妙，回策如絮，善骑者无以过之”，还能将不同类型的马的优劣分析得头头是道。由此可见，马在彼时已成为太原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山西地区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加速时期，少数民族频繁南下，为太原带来了更多的骏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仍然重视马这一战略资源的储备。《通典卷二五职官典》中记载，北魏将河西马“移牧并州”，接着又转移到河阳(今河南孟县)马场，使来自河西走廊的马匹在迁移过程中逐渐适应中原气候环境，太原也由

一腔诗魂 两处风流

丁丽君

身阅兴亡浩劫空，
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不害餐周粟，
有史深悲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
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清·赵翼《题元遗山集》

赵翼，清代诗人、史学家，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钱大昕作品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这首诗是赵翼读元好问文集后，以诗之形式写就的读后感。

首联直陈主题，站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推出一个亲历国破政亡、山河易主的大劫难后，依然耗尽心力修订两朝文献的老翁形象。“身阅”“浩劫空”“两朝”“一衰翁”，形成一种个人与时代的对比。从形象上看，是个人的渺小之于时代的宏阔；从文学史学的价值看，是伟大的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就时首联出语顿挫，含思悲壮，奠定了整首诗深沉蕴藉的基调。

颌联借用“周粟”和“楚弓”的典故，承接首联，进一步对元好问的人格、情怀作出评价。“周粟”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典故；“楚弓”是楚共王遗弓的典故，这里“楚弓”喻指金代文献。“无官不害餐周粟”，意谓元好问虽然入元，但并未仕元，像伯夷、叔齐一样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有史深悲失楚弓”，则形象地描绘了他对故国文献的珍视和忧虑。此联用典精巧，思意开阔，对仗工稳，情感丰富。

颈联运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行殿”的“幽兰”和“故都”的“乔木”仿佛也在为历史的沧桑而悲泣。金朝宫殿幽兰轩里闪烁着悲凉的夜火，故都的乔木在秋风中哭泣，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和情感。诗评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赵翼诗作擅长说理，诗风言简意赅，通篇直叙，不求含蓄唯美。而这首诗却有特别之处，此联意象含蓄形象，强化了沉郁悲壮的色彩，为尾联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尾联，是诗人惯用的理性思辨句式，整首诗在此处得以升华，也成就了无数人吟诵的名句。“国家不幸”却成就了“诗家幸”，痛苦经历成为一种精神财富，使得元好问的诗文更加厚重，更富于深邃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反映了诗人对于历史、文化和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慨。此联言尽意远，发人深省，引发读者跟着诗人的思想放眼世事沧桑，在历史深处，看到、想到和元好问有相似经历的屈原、杜甫、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诗人词家，他们并不想享受“诗家幸”的待遇，但在“国家不幸”的历史遭际之时，他们的呐喊惊天动地，他们的诗笔如锋刀利剑，他们的思想深刻辽远。

遗山先生“天才清峭，邃婉高古，沈郁太和，力出意外”(《遗山先生墓铭》)，其真实反映金朝末年和元朝初年社会现实的《遗山集》，被后世有着同样诗学史学素养的学者赵翼所看见、领悟，或许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契合的历史观、宇宙观、生命观，两位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各自带着观照天地生命、朝代更迭的深邃眼神，跨越时空，在一首七律诗中相遇，成就了一种恒久的美。

诗意图绣太原

(59)

扫码看视频

